

馬禮遜報刊傳教活動研究

劉 偉

[提 要] 新教傳教士馬禮遜1807年來到中國，在清政府教禁森嚴、直接傳教難以開展的情況下，探索多種間接方法傳教，其中尤以報刊傳教具有開創性。本文分析馬禮遜先後直接創辦以及推動創辦的6份中英文報刊的傳播活動及其特點，指出其報刊傳教活動開創了基督教對華傳播的新模式，擴大了新教在華傳播，同時推動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

[關鍵詞] 馬禮遜 對華傳播 報刊傳教

[中圖分類號] B97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4 - 0077 - 09

1807年，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到中國，艱難推進新教對華傳教工作，直至1834年辭世。馬禮遜被譽為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先驅，他克服清政府教禁森嚴等重重困難，努力探索對華傳教的有效方式，在傳承明清時期耶穌會文字傳教經驗的基礎上，推動創辦或積極參與共達6份中英文報刊^①，包括在馬六甲主導創辦與對華傳教關係密切的報刊2份、積極推動創辦或作為重要撰稿人參與的報刊2份、直接在中國主辦報刊2份，前後延續近20年，開創了報刊傳教這一基督教對華傳播的新模式，對擴大新教在華影響、促進傳教事業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並在中國近代新聞史的開篇留下了重要一筆。

一、馬禮遜對華報刊傳教的想法萌芽

1807年9月，馬禮遜受英國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倫敦會）派遣來到中國傳教時，正值“禮儀之爭”之後清政府嚴厲禁教，只能潛居於外國人經商居住的廣州十三行內，暗中努力完成倫敦會交給他的學漢語、編字典、譯聖經三大任務。^②1809年，馬禮遜被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任命為中文譯員，方得以有合法身份居留中國，但口頭佈道仍難以公開進行，傳教工作只能通過出書籍、辦學校、興醫務等間接方法開展。在嘗試種種傳教辦法之後，馬禮遜認為文字傳教是向中國傳播福音最有效的方法。從1810年開始陸續翻譯、刻印《使徒行傳》，馬禮遜寫書出版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曾說，“從1810年到1836年，有不少於751,763冊勸世小冊子和書籍從中國的傳教印刷所中分發到各地。這些書中相當數量的圖書都是馬禮遜博士撰寫的”^③。在延續明清耶穌會士出版傳教方法的基礎上，馬禮遜進一

步探索開創了報刊傳教的方法。

馬禮遜在從英國來華之前已不時接觸到傳教刊物。在馬禮遜早期日記裡，曾經提到他讀過在愛丁堡發行的月刊《傳教雜誌》（*Missionary Magazine*）和當時一份方便購買、容易閱讀的新教刊物《福音雜誌》（*Evangelical Magazine*）^④。1807年11月4日，馬禮遜剛抵達中國兩個月，在寫給倫敦會的信中專門提道，“如果要給我寄東西，首先給我寄一些長信，還有雜誌、《中間派評論》（*Eclectic Review*）、各類傳教刊物，都是最受歡迎的。”^⑤1815年1月9日，他在信中更加強烈地表達了這一迫切心理。^⑥在英國國內閱讀傳教雜誌的經驗，與他來到中國後難以看到類似雜誌形成鮮明反差，他在後半生中經常說起這一時期渴求書籍卻得不到的失落感。^⑦

馬禮遜最早提出創辦報刊，是1815年在由他和米憐（William Milne）共同制定的恒河外方傳道團（The Ultra-Ganges Missions）^⑧傳教計劃決議書中。這份決議書對恒河外方傳道團未來工作提出了10項具體任務。其中第4項提出：“在馬六甲出版一種旨在傳播普通知識和基督教知識的中文雜誌，以月刊或其他適當的期刊形式出版。”第8項提出：“非常期望出版一種英文期刊，旨在增進倫敦傳教會在印度不同地區傳道團之間的聯繫與合作，並增進普遍友愛和基督徒美德的善行。希望能在馬六甲迅速著手開展此項工作，並懇請福音的同工們協助我們。”^⑨創辦中文雜誌、英文期刊分別被作為倫敦會對華傳教事業的重要內容提出。

1815年5月，按照決議書的安排，馬禮遜派遣米憐來到馬六甲，逐一落實恒河外方傳道團的各項計劃，中文雜誌和英文期刊隨後陸續面世。

二、馬禮遜報刊傳教活動實踐

馬禮遜報刊傳教活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15年至1822年，先後在馬六甲創辦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以下簡稱《察世俗》）、英文季刊《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這兩份報刊均由馬禮遜策劃主導並撰寫稿件，米憐則在馬六甲具體負責編務、撰寫稿件，耗費了極大功夫。1822年米憐因積勞成疾去世，兩份報刊被迫停刊。第二階段是1827年至1834年馬禮遜辭世，他從英國休假結束再次回到中國後，承擔了《廣州紀錄報》（*Canton Register*，第2期起改名為 *The Canton Register*）的撰稿任務，推動創辦了《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並直接創辦了《雜聞篇》和《傳教者與中國雜報》（*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

1815年8月5日《察世俗》創刊，這是第一個中文近代報刊，也是外國人所辦的第一個以中國人為宣傳對象的報刊。^⑩該刊儘管創辦於中國境外，卻是我國近代化報刊的肇始。^⑪恒河外方傳道團傳教計劃對其辦刊目的作了明確表述，即“旨在傳播普通知識和基督教知識”。該刊內容首為宗教，注重對《聖經》基本思想的講解，還闢有《聖經節注》專欄，同時大量刊載《聖經》故事，通俗地宣傳基督教。^⑫《察世俗》在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地位已得到公認，而從基督教傳播的角度來看，《察世俗》的創辦則開創了新教報刊傳教的模式。與出版書籍相比，出版連續刊物一方面可以把基督教義闡述得更加充分，通過信息的持續傳遞，不斷強化所要表達的內容，另一方面，這也極大地解決了編者事務繁忙所帶來的時間和精力上的困擾等難題，“事先規劃好一篇文章的內容，再按順序每月編寫一部分——或歷史系列文章的小片段——或一篇講道詞的各部分等，——這樣工作可以持續進行，計劃也得以逐漸完成，到年底的時候，作者就有了12篇不同的文章或不同片段的系列討論。”^⑬而且，每個月必須按時寫稿付印，也有效地激勵了編者的工

作。1820年1月7日，馬禮遜在致英國福音小冊公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司庫雷諾（Joseph Reynor）的信中感謝公會對《察世俗》的出版資助，並表示他“毫不懷疑這要播撒的種子最終會大獲豐收”^⑭。

《察世俗》的成功創辦，極大地鼓舞了馬禮遜。1817年5月，英文季刊《印中搜聞》在馬六甲創辦，前後歷時6個年頭，總計發行3卷20期。《印中搜聞》忠實地貫徹了恒河外方傳道團臨時委員會決議和增補決議中關於“中國是恒河外方傳道團的主要目標”、“馬六甲佈道站最初是出於對中國特殊的考慮而建立的……所以佈道站所有的事務，應該與此最初的設想保持一致，優先考慮中國”^⑮的任務定位，以大量的篇幅介紹中國的情況。

從傳播對象來看，馬禮遜把當時著作出版的印刷品分為“所翻譯和編寫的中文書籍”與“面向歐洲讀者的書籍”兩部分，《印中搜聞》被納入後者，並且注明屬“並非由任何特定宗教團體出資印刷”^⑯。根據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司庫約瑟夫·伊瓦茨（Joseph Evarts）與馬禮遜的通信記錄，當時《印中搜聞》也傳到了美國。^⑰米憐在與馬禮遜通信時曾直言：“《印中搜聞》問世後會遭人蔑視或者被人忽略，我已經有所準備。對於飽學之士來說它不夠深入，對於宗教界來說它的宗教色彩不夠濃厚，對於世俗的人來說它不夠生動有趣，而高雅的人和高談闊論者又會覺得它不夠高雅，只有傳教士、書商、博愛者、人文學者能包容它的缺陷和不足。”^⑱米憐還說，“此刊盡可能選擇哲學家、歷史學家，尤其是傳教士感興趣的資料。”^⑲由此可見，歐美的傳教士、書商、哲學家、歷史學家等是其主要傳播對象。

在馬禮遜看來，《印中搜聞》無疑是其在華傳教計劃的一部分，其耗費大量精力從事這項工作，根本上還是要服務於其傳教目的。《印中搜聞》持續出版，既反映了倫敦會在華傳教進展情況，同時其所刊載的有關中國的消息、資料、譯文和評論，又成為歐美知識界與社會公眾瞭解和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來源。美國學者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評價，“這份雜誌在當時是對地球這一端的語言和文化感興趣的西方讀者的重要信息來源，上面的文章亦經常被英美的傳教雜誌轉載。”^⑳1824年，《印中搜聞》停刊近兩年後，馬禮遜回到闊別已久的英國，獲得英國國王喬治四世接見，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赴各地訪問演講受到熱烈歡迎。《印中搜聞》對馬禮遜在英國影響的貢獻，除了翻譯中文《聖經》和編寫出版《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外，就向英國國內傳遞中國信息來說，恐非其其他文字傳教作品所能及。

1826年5月，馬禮遜離開英國返回中國。與他回英國前相比，此時他因深陷與英國傳教團體矛盾、個人健康衰弱、經濟面臨較大壓力，陷入人生最為艱難的階段。他繼續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從事報刊傳教活動，希望以此重振往日輝煌。

1827年11月8日，中國第一份英文報刊《廣州紀錄報》在廣州創刊。該刊創刊初期便熱情地請求馬禮遜支持，馬禮遜提出在能對其所致力推動的那些道德和宗教問題完全自由表達觀點的條件下可以幫助，該報欣然應允。^㉑馬禮遜隨即開始為之撰稿。當年11月15日出版的第2期報紙上，刊出署名為“Amicus”並標明寫於11月10日的“讀者來信”^㉒，這是馬禮遜在該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馬禮遜在尊重該報作為商業報紙定位的前提下，積極影響該報，同時又表示“除了寫寫短篇記事，我與這份報紙毫無關係”^㉓，有意與之保持距離。這應該和報刊創辦人馬地臣鴉片商的身份有關係，《廣州紀錄報》不僅經常記載鴉片貿易情況，而且竭力為鴉片貿易合法化辯護。作為傳教士，馬禮遜對英國人在華鴉片貿易始終抱持異見。馬禮遜為該報所撰稿件大多以新聞為主，包括翻譯《京報》新聞以及撰寫本地的社區新聞。

1832年5月，由馬禮遜倡議，美國美部會傳教士裨治文負責編輯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創刊。該刊的發行對象為歐美各國政府、商業團體和在華外僑，其目的是“在外國人當中傳播關於中國的消息，它的法律、習俗、歷史和時事，以及有關對中國人傳教的教會消息”^④。該刊辦刊近20年直至1851年底停刊，成為當時中國境內出版的影響最大的外文期刊之一。馬禮遜既是創辦該刊的主要推動者，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筆者根據衛三畏在《中國叢報》停刊後所作的文章和作者索引，並結合前3卷內容作了一番統計，從1832年5月到1834年8月，馬禮遜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為《中國叢報》撰稿達97篇，內容廣泛涉及中國的政治、法律、語言、文學、人口、自然、宗教、哲學、對外關係等各個方面。在各種任務非常繁重的情況下，兩年多時間在一份報刊上發表這麼多文章，足見馬禮遜對其重視的程度。

1832年11月，馬禮遜在澳門成立了馬家英式印刷所（The Morrisons' Albion Press），開始自己直接創辦報刊。1833年4月29日，馬禮遜創辦了中文報刊《雜聞篇》，由馬家英式印刷所印刷，隨後於當年8月29日、10月17日出版了其他兩期，合共出刊3期。^⑤該刊比1833年8月1日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還要早3個月，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⑥《雜聞篇》絕大多數篇幅刊載宣傳基督教信仰的內容，免費分發，每期印刷達2萬份。這是馬禮遜首次在中國土地上直接印刷出版中文傳教報刊，其面向中國人。與十多年前只能在馬六甲出版中文傳教報刊相比，在出版地點和發放渠道上，距離新教對華傳教的目標受眾都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

1833年5月1日，《雜聞篇》出刊兩天後，中國首份中英雙語不定期報刊《傳教者與中國雜報》在澳門出版，主編及印刷者為馬禮遜。該刊各期內容主要有三個類型：宗教知識及教義討論、中國文化知識、各地消息及評論^⑦，每份售價“1 mace”（一角）。該刊後因內容引起澳門天主教會不滿，澳門政府遂致函東印度公司，以違反當時“出版預檢制度”為名，下令關閉馬家英式印刷所，遂於6月3日停刊，出刊4期^⑧。而馬禮遜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出版的傳教色彩更為濃郁的《雜聞篇》，卻並未引起澳門天主教會的過多關注，並且在《傳教者與中國雜報》停刊後繼續出版，大概還是因為《傳教者與中國雜報》的傳播對象涵蓋了當時澳門的西方人和當地華人，威脅到了天主教長期以來在澳門的主導地位，因而導致了澳門天主教會的強烈反應。

三、馬禮遜報刊傳教活動特點分析

基督教四度來華，每度傳教策略皆因應當時的歷史社會條件而有不同。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溫教、明清的天主教來華皆奉行自上而下的策略，唯馬禮遜新教入華在清朝閉關鎖國、嚴厲禁教的情況下採取自下而上的策略。戈公振對此有過一段比較論述，指出“基督教傳教之方法，舊教由上行下，故重在著書；新教由下向上，故重在辦報”^⑨，可謂一語中的。出版在傳教事業中起著重要作用，與佈道、教育、醫藥並稱為基督教傳教事業的四大支柱^⑩，也有人將文字出版與辦學、行醫、慈善事業一道稱為傳教事業的助推器^⑪。新教入華時，西方近代報刊事業已經得到很大發展，歐美報刊傳教活動已很普遍，因此，馬禮遜在直接傳教受到嚴格限制的無奈情況下，在嘗試辦學、行醫、出書等多種方式之後，自然想到借助創辦報刊進行傳教。創辦報刊是手段，傳教是目的。馬禮遜的報刊傳教活動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策略：“適應性”的調整與發展

在中西文化交流進程中，馬禮遜時代處於一個重要而特殊的階段。明清之際天主教傳教士對

中國文化有相當的認同與尊重，雖然後來有禮儀之爭，但並沒有影響以耶穌會士為主體的天主教傳教士群體對中華文化的主流認識和敬仰。及至晚清，隨著中國國力衰落和中國社會各種負面問題的出現，新教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認知與理解，與明末清初時期相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門戶洞開前，來華新教傳教士對中華古老文明保持最後一絲尊重的同時，對中國文化和社會展開了較多批評，對耶穌會士的傳教策略進行反思。馬禮遜的報刊傳教活動，既延續了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對華傳播的適應策略³²，又結合新教在華傳播所面臨的實際情況作出調整。

創辦《察世俗》時，馬禮遜便注意採用迎合中國人的思想習慣和運用中國人所熟悉的方式來宣傳基督教思想，盡可能“附會儒學”。《察世俗》刊登了不少倫理道德方面的內容，大量引用“四書”“五經”和孔孟程朱的言論，宣揚儒家的綱常倫理，以此博得中國人的認同。《雜聞篇》同樣貫穿了這一基調，比如其第一期第三則和第四則內容，將推廣聖經內容與中國傳統的倫理價值觀“父慈子孝”結合起來，所以有了“父母要教孩子走路及學習神天之理”和“要孝順，要照主誠做事，忤逆是大惡也”這一類的表述。³³同時，與天主教走上層路線、關注士大夫階層不同，新教傳播更多針對中國社會的中下層貧民。馬禮遜在翻譯《聖經》過程中，便對選擇何種文體和風格頗費了一番腦筋和周折，最終決定採用介於文言和白話之間的折中體，因為這既沒有超越目不識丁之人的理解水平，又不會讓受過良好教育之人感到鄙俗。³⁴《察世俗》等報刊文章在寫作手法上廣泛採用章回體以及中國古典小說中的一些套語，如結尾常用“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等，以符合“下里巴人”閱讀習慣的方式寫作稿件。他還創造出以《張遠兩友相論》為代表的對話體，以講故事的方式由淺入深地解釋並宣傳基督教，千方百計使中國人易於接受。

在意識形態層面，馬禮遜以主觀的意願堅持轉化華人的宗教和文化，而不願客觀理性地從中華文化的思想意識和社會背景去瞭解中華文化，故對儒學的評論難免先入為主、失諸公允，甚至獨斷地認為儒學一無是處³⁵，但技術層面仍迎合中國普羅大眾，注重世俗宣教。這種宣教方式，本身就是對適應策略的調整與發展。

（二）途徑：直接傳播與迂迴傳播互補

馬禮遜在華從事各項工作的終極目標，都是圍繞傳教進行的。儘管他一生中擔任過不少職務，包括為東印度公司擔任譯員，隨英國特使阿美士德到過北京，但他說“他第一位的身份還是傳教士”³⁶。馬禮遜的報刊活動同樣圍繞傳教這一目標進行，其中既有面向華人、以傳播教義為主的直接報刊傳播，也有面向歐美社會及在華西人社群通過漢學推介、傳遞信息、爭取支持的迂迴報刊傳播。或直接或間接，或緊密或鬆散，兩者始終並行發展。

就直接傳播而言，主要體現在《察世俗》《雜聞篇》這兩份以中文寫作、面向華人、以傳播基督教義為主的報刊。《察世俗》創辦的初衷即為“旨在傳播普通知識和基督教知識”，創刊序言中進一步強調以闡發“神理”為根本要務，內容設置和形式編排都圍繞和服務於闡發“神理”這一目標。《雜聞篇》總三期絕大多數篇幅是宣傳基督教信仰的內容。這兩份報刊都採取了免費贈送的辦法，前者前5年印刷量達37,860份³⁷，刊登在《察世俗》中有影響的文章，後來都以小冊子形式重新出版，流傳甚廣；後者雖然只延續3期，但每期印刷多達2萬份。免費派送與大量印刷，顯現出其對內容的時效性極少關注，符合這兩份報刊作為基督教宣傳品的特點。

就迂迴傳播而言，主要是借助《印中搜聞》以及《傳教者與中國雜報》《廣州紀錄報》《中國叢報》等英文報刊所開展的面向歐美社會和中國境內的西人社群的傳播活動。耶穌會時代在實現讓中國人信仰基督教的目標過程中採取了一種特殊方式：他們在歐洲傳播關於中國的信息，以

便取得歐洲學者和統治者們對他們傳教事業的廣泛支持。³⁹這一方式得到了馬禮遜的極大關注和高度重視，並在報刊傳教實踐中充分借鑒運用。4份英文報刊中，馬禮遜投入精力最大、寫稿數量最多、持續時間較長的是《印中搜聞》，傳播地域範圍包括英國、美國以及亞洲許多地區，通過介紹中國哲學和宗教文化，展示對中國政局的關注和對華傳教的艱難，積極爭取歐美社會對在華傳教事業的支持。《傳教者與中國雜報》雖然出刊時間短，但這是馬禮遜唯一全身心投入、整個編務在其主導之下而創辦的。這份旨在給在華基督教社群“帶來更具福音性質的內容”⁴⁰的報刊，主要面向在華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知識以及在華傳教工作情況，吸引在華外國人的關注和支持。對《廣州紀錄報》和《中國叢報》的參與撰稿，馬禮遜竭力影響其更多關注中國的時事政治和社會文化等宏觀視野，擴大對西方社會與在華西人社群的傳播。同時，這4份報刊都定位於“非直接傳教”，因而與《察世俗》《雜聞篇》免費贈送讀者不同，它們都明碼標價，這也顯示出不同於宣傳品而以提供實用信息為主的商品價值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馬禮遜面向中國人的辦報傳教和面向西方人的介紹報道中國，總是同步推進的。在創辦《察世俗》取得成功後，不久就創辦了《印中搜聞》，《雜聞篇》與《傳教者與中國雜報》在同一時段創辦。這體現了馬禮遜把爭取西方社會的支持放在與對中國人傳布福音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彼此互補，相得益彰。

（三）內容：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並重

馬禮遜所辦中文報刊突出傳播基督教義，同時輔以西學實用知識。《察世俗》和《雜聞篇》都以絕大多數篇幅刊載宣傳基督教信仰的內容。而傳播“歐洲學科中吸引中國人的那些方面”，則在馬禮遜中文辦報活動中承擔了吸引讀者的重要職責。《察世俗》自述其辦報之旨趣：“本報雖以闡發基督教義為唯一急務，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視為緩圖而掉以輕心。”⁴¹《察世俗》的宗教與倫理內容超過85%，其他就是科技、史地、文學等一般知識。⁴²《雜聞篇》第二期第三則《胎生聾而啞巴者論》，從現代醫學的角度說明失聰的原因，並以此反駁中國人對“胎生聾”種種迷信的論調；該期第四則《外國書論》以只有200字的篇幅，成為中國刊物上最早介紹西方活字印刷術和西方報業的中文文獻，分別引介了西方的醫學觀念、活字印刷術和“新聞紙”的概念。⁴³這些報刊通過展示、宣傳高於或異於受傳對象所掌握的知識，取得受眾好感、信任和尊敬，或在展示、宣傳各種知識的同時夾帶教義，進而服務於傳教的目標。⁴⁴

英文報刊則以中國政經社情等現實情況和傳播漢學為主。《印中搜聞》以突出報道中國為主題，介紹了大量中國的信息，據筆者統計，共報道了180餘條中國時事動態消息，詳細介紹了14部傳統文化作品，翻譯了32篇有關中國哲學和文學等方面的作品，並介紹了中國各類宗教的發展情況，為西方社會瞭解中國提供了大量翔實的資料。馬禮遜為《中國叢報》和《廣州紀錄報》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的文章，作為當時唯一在中國長期生活並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西方人，他筆下的中國成為西方瞭解中國的重要信息來源。

（四）渠道：兼顧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傳播體系

報刊印刷出版後必須要送達讀者手中，才可能產生傳播效果。根據《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一書記載，1819年時馬六甲佈道站的中文出版物已經廣泛分發，⁴⁵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包括《察世俗》在內的這些中文出版物的傳播路線圖，其中既包括了英國和美國這樣一些當時新教傳教活動風行的歐美國家，也有以馬六甲向周邊輻射的一些新教傳教士已經到達的國家和地區，還有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中國本土。而凡是馬六甲佈道站中文出版物所及之處，《印中搜聞》也同

樣可以借此渠道傳播發行到英國、美國以及許多亞洲地區。由此可見，《察世俗》《印中搜聞》等報刊已經形成一個包括面向中國和歐美以及亞洲許多地區的廣泛傳播渠道。

當時澳門也能夠看到馬禮遜的報刊出版物。1820年10月第14期《印中搜聞》刊出一篇葡萄牙人寫的《關於葡萄牙人居留澳門的歷史》^⑤，對《印中搜聞》第10期的文章內容作出回應。而後來《傳教者與中國雜報》被迫停刊，也說明馬禮遜的報刊活動尤其是英文報刊活動得到居澳葡萄牙人的密切關注，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馬禮遜所辦報刊在澳門落地的情況。

四、馬禮遜報刊傳教活動的影響

馬禮遜投身報刊傳教活動，持續時間長，投入精力多。在其報刊傳教的第一階段，雖然只有米憐以及其他零星傳教同工的協助，勢單力薄，但在當時對華傳教活動“一枝獨秀”的情況下，其報刊傳教更具開創意義。後一階段，馬禮遜陷入人生困境，又面臨著居澳葡萄牙人和在穗西人等諸多辦報競爭，其辦報活動顯得左支右絀，力不從心，但總體來說，其報刊傳教活動具有深遠影響。

（一）開創了基督教對華傳播的新模式

與前人的文字傳教活動相比，《察世俗》和《雜聞篇》的創辦，豐富了此前以出版書籍和傳單為主的文字傳教形式，奠定了傳教士在華創辦中文報刊的基本樣式，開創了基督教報刊傳教的新模式。《察世俗》之後至鴉片戰爭之前，其他傳教士先在南洋地區、後在中國境內另外創辦了4種中文報刊，這些報刊都帶有或濃或淡的宗教報刊色彩。英文報刊方面，《印中搜聞》的理念和編輯方法，也都為後來在中國創辦的英文報刊所追隨模仿，刊載了大量介紹中國時政、經濟、社會類信息，為擴大歐美社會對中國的瞭解、爭取對中國傳教事業的支持發揮了積極作用。馬禮遜病逝後不久，鴉片戰爭爆發，中國的門戶被打開，傳教士可以公開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不再如從前般躲躲藏藏，基督教對華傳教事業包括報刊活動進入一個新階段。但馬禮遜的報刊傳教活動作為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時空環境下的產物，為後來的報刊傳教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對馬禮遜以“Master Builder”相稱，簡又文將之譯作“傳教偉人”，而李志剛認為譯為“創建大師”更為適宜，並指馬禮遜文字宣教事業最為偉大，主張稱馬禮遜為“文宣大師”，進而指出馬禮遜為19世紀的傳教士樹立了風範，引發到中國傳教的作用。^⑥此言不為過矣，單從開創報刊傳教模式的角度來看，馬禮遜無愧當此殊榮。

（二）推動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

與馬禮遜密切相關的這6份中英文報刊，包括了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最早系統介紹中國情況的英文報刊、中國第一份英文報刊、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第一份英文報刊、中國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中國第一份中英雙語報刊，佔據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史源頭的重要部分。

《察世俗》與《雜聞篇》的成功創辦，對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創辦的《特選撮要每月記傳》《天下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各國消息》等其他4份中文報刊，無論是在辦刊特點、風格還是人才培養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曾協助《察世俗》辦刊工作的麥都思於1823年在巴達維亞創辦《特選撮要每月記傳》，表明“書名雖改，而理仍舊矣”^⑦，其辦刊宗旨、風格、版式與《察世俗》一脈相承。倫敦會傳教士吉德（Samuel Kidd）於1828年在馬六甲創辦《天下新聞》，該刊只維持了一年多時間，因至今未發現原件而難以查考詳情，但吉德在英國時曾向回國休假的馬禮遜學習中文，後來又擔任英華書院院長，加之該刊曾載有傳教內容等，不難看出其受馬禮遜和《察世俗》的影響。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

記傳》得到了馬禮遜的幫助和支持。他經過澳門時，受到馬禮遜夫婦的歡迎，其航行日記經馬禮遜推薦在《中國叢報》上刊載引起轟動。與《察世俗》相比，《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內容出現了從傳播西教到傳播西學的轉變^④，但兩者形式仍頗為相似，木板雕印，都採用中國線裝書樣式，都附會儒學大量引用中國儒家語錄。《各國消息》由麥都思於1838年在廣州創辦，其報道編排方式，模仿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由刊物形式和麥都思的經歷可見《察世俗》的影響。

《印中搜聞》的創辦對創建中國英文報刊事業具有重要的先導意義。在《印中搜聞》之前，略早創刊且與中國相關的英語刊物只有《亞洲雜誌》（*Asiatic Journal*, 1816-1845）和《布萊克伍德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 1817-1845）^⑤。更早些時候，歐洲天主教士陸續東來並打入中國宮廷後，分別用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英文等多種文字譯介中國情況，借此西方才逐漸對中國有所瞭解，但總體上這種瞭解更多停留在東方神秘古國的概念和印象中。《印中搜聞》是19世紀初期唯一出於向中國傳教目的而創辦的、並且以相當大篇幅比例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情況的刊物，雖然中國新聞史上對之提及甚少，但通過大量報道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和中國時政消息，對漢學發展和中國形象的早期傳播具有特別意義，《印中搜聞》理應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同時，《印中搜聞》將西方新聞觀念和技術引入中國，其辦刊模式為《廣州紀錄報》《中國叢報》以及隨後出現的中國其他各英文報刊所追隨和借鑒。

（三）推進了跨文化傳播

在人類文化交流史上，當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另一個國家或地區時，必然會與原有文化發生碰撞。馬禮遜的報刊傳教活動注意延續發展“適應”策略，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並重，有效地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印中搜聞》持續出版，客觀上滿足了西方公眾對中國的信息瞭解需求。而《察世俗》《雜聞篇》等中文報刊，則向中國持續傳播了大量西方的新興知識，打開了國人的思維。雖然馬禮遜報刊傳教活動在傳播教義、引人入教方面收效有限，但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與傳播漢學方面則作出了顯著貢獻。

美國學者保羅·科恩（Paul Cohen）認為：“評價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標準，不在於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於它為後來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礎。”^⑥李志剛在論及馬禮遜的漢學成就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時曾精確指出：“綜觀一般漢學家，其事業以‘中學西傳’較多，而以‘西學東傳’則較少，對中西文化交流只屬單程性的貢獻。而馬禮遜牧師既能使‘中學西傳’，又能使‘西學東傳’，此種雙程性的貢獻，才能促進中西文化相互往來的交流。”^⑦對馬禮遜來說，創辦報刊是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傳教工具與手段，同時客觀上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收到了“無心插柳成蔭”之效，取得了豐碩成果。

①19世紀初期對“報”與“刊”的概念區分不如現代明確。本文對此亦不作明確區分，將當時的連續出版物統稱為“報刊”。

②倫敦會交給馬禮遜的三大任務，詳見倫敦會給馬禮遜的“工作指示”。見艾莉莎·馬禮遜（Eliza Morrison）編：《馬禮遜回憶錄1》，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翻譯組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51頁。

③Walter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 London, 1838, p.592.

④⑤⑥⑦ 艾莉莎·馬禮遜編：《馬禮遜回憶錄1》，第4～5頁；第91頁；第228頁；第5頁。

⑧倫敦會1813年派遣米憐來華協助馬禮遜傳教，但米憐來華後無法立足，馬禮遜遂讓其去東南亞實地考察並建立起面向中國傳教的基地，稱為恒河外方傳道團。

⑨⑬⑮⑯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米憐 (Willam Milne)：《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65～66頁；第73頁；第92～95頁；第127頁；第89頁；第43～44頁；第124頁；第133頁。

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72頁；第172～173頁；第181頁。

⑪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8頁。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艾莉莎·馬禮遜編：《馬禮遜回憶錄2》，第14頁；第62頁；第8頁；第193頁；第193頁；第240頁。

⑳ 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裨治文傳》，尹文涓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3頁。

㉑ 吳義雄推測，Amicus 就是《印中搜聞》的發起人馬禮遜，認為“除他之外，在當時的廣州英人中，有如此的中文水平、且對《印中搜聞》有如此熱情的人，應該再也找不出來了。”見馬禮遜、米憐主編：《印中搜聞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5頁。龔道運也認為，馬禮遜曾用筆名“Amicus”在《廣州紀錄報》前七卷和《印中搜聞》上發表多篇文章。見龔道運：《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65頁。據筆者統計，馬禮遜用 Amicus 為筆名在《印中搜聞》上共發表 25 篇文章，《廣州紀錄報》除第一卷第 2 期外，未見其他“Amicus”署名文章。

㉒ 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陳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86頁。

㉓④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51～52頁；第163～170頁。

㉔ 林玉鳳：《中國境內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雜聞篇〉考》，北京：《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11期。

㉕③④② 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 (1557-1840)》，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52頁；第136頁；第136～137頁。

㉖ 《馬禮遜回憶錄2》中記載出版了6期，但目前只見到4期原件。見艾莉莎·馬禮遜編：《馬禮遜回

憶錄2》，第240頁；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 (1557-1840)》，第148頁。

㉗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106頁。

㉘④③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 (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1頁；第34頁。

㉙ 羅偉虹主編：《中國基督教 (新教) 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頁。

㉚ 孟德衛將耶穌會傳教事業在中國開闢的能設身處地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並顯示其靈活性的路線，稱為“適應性的” (Accommodative) 或“耶穌會的適應政策” (Jesuit accommodation)。見孟德衛：《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陳怡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導言”第1～3頁。

㉛ 龔道運：《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第47～48頁。

㉜ 湯森：《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王振華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譯者的話”第3頁。

㉝ 孟德衛：《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導言”第1頁。

㉞ 轉引自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64頁。

㉟ 馬禮遜、米憐主編：《印中搜聞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第686～688頁。

㊱ 李志剛：《基督教在澳門》，澳門：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2006年，第168～173頁。

㊲ 《特選撮要序》，《特選撮要每月記傳》，道光癸未年六月 (1823年)。

㊳ 宋麗娟、孫遜：《近代英文期刊與古典小說的最早翻譯》，北京：《文學遺產》，2011年第4期。

㊴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年》 (上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604頁。

㊵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第49頁。

作者簡介：劉偉，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7

[責任編輯 陳志雄]